



▲2月4日,武汉火神山医院开始收治确诊患者,医护人员将患者送入病房。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

口述:肖静 | 49岁 | 网店店主 | 武汉
整理:张宇琪 | 本报记者
编辑:黄海波

现在,我在家陪着10岁的女儿上网课,一天三顿变着花样给她做好吃的。因为疫情的缘故,难得闲下来,和老公女儿晒晒太阳,享受着生活的烟火气。

但今年春节的那次遭遇,至今回想起来,难免还是心有余悸。

春节前,我和女儿订了一张日本观光邮轮票,航程共6天5晚。按照正常的行程,这艘邮轮回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的时间,应该是大年初一早晨。

可谁曾想,船上有15个人出现发热症状。而且,包括我和女儿在内,船上有148名湖北籍旅客。当时,疫情不断升级,我们这艘邮轮要靠港简直太难了。

没错,我乘坐的就是“歌诗达赛琳娜号”——一艘引发很多人关注的邮轮。

本来,在大年初一早上,我醒得挺早。想着邮轮要到港了,终于可以和女儿结束旅程,开开心心地回家了。

当时,对疫情也有一点担忧。由于邮轮上没有信号,之前靠泊日本佐世保港时,我才听说武汉“封城”的消息。但没想过疫情后来会这样严重。

通关入境日本时,我虽然不认得日文,但看到不少牌子上,都写着“武汉”两个汉字。听说我和女儿来自武汉,日方人员测量体温时,就会重点关注。

返回天津靠港的前一天,我们在邮轮上看了春晚,竟然有临时增加抗击疫情的特别节目。看到这一切,我更加担心了起来,当时就想着赶紧下船回家。

大年初一早晨,收拾妥当行李后,我把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的,叫上隔壁屋同行的朋友,一起去餐厅用早餐。

早上7点多,用餐的时候听到广播响起:天津海关已经上船检查,所以暂时不能靠岸,请大家在各自的房间等候。

当时,不少人跑到服务台去问,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,什么时候能下船。不少人已经订好了高铁、飞机或酒店。我和女儿也准备先去北京,再坐飞机回武汉。

餐厅里旅客们开始议论纷纷了,说什么“好像船上有人发热病人”“听说有穿防护服的人上船检查”“要是查出被感染者,所有人都无法上岸”……感觉大家有些恐慌了。

我和女儿也没办法,只能回到房间里,等待海关进屋来检查。虽然心里挺害怕的,但又什么也做不了,只能干等着。

女儿一直问我,“妈妈,我们为什么不能下船了”。我只能一遍遍安慰她。

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喊“来了,来了”。我推开门,看见走廊那头,两名全副装备的医

人员正挨个敲门。

那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,看到全身穿防护服的人,感觉像是电影中的场景一样。我愣了愣神儿,又关上门等着。

过了一会儿,敲门声响起,全身防护服的人站到了我面前。他们说话很和气,测完体温,又详细询问了我们近期的旅行居住史和密接人群。检查过后,说了一句“谢谢配合”,轻轻带上离开。

过了一会儿,又听别的房间里有人议论,说刚才有直升机飞过来了。不一会儿,大家又在聊,“海关已经把发热人员的样本采集完,由直升机送走了”。

在船上潦草吃了点午饭,我们又返回房间里,一直等待着。船上大部分游客,表面上保持着镇定。所有人都心照不宣,只要有人感染,大家恐怕都要隔离。

我们的房间没有窗,待久了觉得压抑得很。我已在心里做着最坏的打算,如果被隔离,不知多久才能回家。

想到这里,我又开始有些后悔了——当初预订邮轮时,为了省点儿钱,没订带窗和阳台的房间,实在不应该。

害怕、焦虑、后悔、无奈、压抑,一时间心里五味杂陈,不知道未来会向什么方向发展。

后来,听朋友说,甲板上有微弱的信号。我就穿了件厚衣服,登上甲板给家里打电话。

海风呼呼地吹,特别冷,我只能用断断续续的信号大声喊,告诉家人自己和女儿怎么样了。

等着等着,已经到晚上了。听说上午采集的样本,都是阴性的,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晚上8点多,邮轮上的旅客陆续下船了。

下船后,我和女儿,还有其他湖北籍的旅客,被天津滨海新区政府安排到一个酒店隔离。酒店环境挺好,住进去感觉挺安心的。之前一直在邮轮上漂着,终于能踏实地在陆地上,睡个好觉了。

当地政府对我们很照顾,酒店服务员也很热情,没有人因为我们是湖北人,而有什么推阻躲闪。

每天两次,有人提醒我们量体温。酒店每天提供不重样的餐食,还问我们想吃什么,说是要给我们做,感觉很温馨。

我也一直关注着武汉的情况。家里人都劝我,说武汉疫情严重,如果能在天津多待几天,尽量晚些天再回来吧。于是,我和女儿就在酒店安心住下了。

一直在天津待到2月22日,我们才回武汉。到家后,每每想起邮轮上的经历,虽然有惊无险,却也把人折磨得够呛。

自此,也对天津有了一份新的情感。想着疫情结束后,一定要再去一次天津,好好看看这个城市。

爷爷永远留在这个冬天

口述:汪诚 | 34岁 | 工程师 | 北京
整理:程露、黄燕 | 本报记者
编辑:完颜文豪

春节回湖北麻城老家,除了看望老人,岳父母还有一个安排:参加他们外甥的婚礼。但这突如其来的疫情,给婚礼蒙上了阴影。

远在宜昌某武警部队的新郎,可能无法按计划回家成亲了。

但新郎的父母——我妻子的舅舅、舅妈觉得,喜帖发出去了,喜宴也定好了,再改不方便。老两口打算让妹妹代替哥哥,跟新娘完成婚礼仪式。

妻子回麻城后,越想越不放心,不赞成这时还搞大型聚会。她给舅舅和表弟发信息,劝他们取消婚礼。

大年三十的早晨,满桌的菜肴,却没有一个人动筷子。

在焦虑与不安中,我们全家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:立即返京。

父母和妻子匆忙收拾行李,连亲戚朋友送来的土鸡蛋、老米酒等特产,都来不及装进后备厢。安顿好80多岁的奶奶后,我们驱车一路向北。

上高速两小时后,麻城,这个湖北省黄冈市下属的县级市,宣布关闭离城通道:火车站关闭,高速公路出口实行交通管制。

我摸摸羽绒服口袋里还没来得及掉退的高铁票,吓出一身冷汗。

原本,我们计划带着3岁半的儿子,初四坐高铁返京。由于新冠肺炎疫情,退了两次票,最后换成大年三十下午的票。

如果不是开车,我们可能就走不到了。

时间回到1月21日,专家已经确定新冠肺炎人传人。我和妻子商量,从北京回老家的路线,改从安徽六安转车,不走武汉了。

次日一早,我们一家三口戴着口罩,背包里装着家中所有存货——大概十几个口罩,赶往北京南站。

同一天,我的父母和岳父母,分别自驾从北京出发去麻城。因为担心十几个小时的车程太长,小孩子坐不住,我们就没有跟他们同行。

很多人说我们一家人心真大,现在想来也很后怕,出发前并不知道疫情如此严重。

我平时工作忙,除了过年,很少有机会回老家看望奶奶。我从小跟着奶奶长大。几年前,奶奶得了阿

尔兹海默病,记得的人越来越少。

今年,我妻子的爷爷病重。这次,我们老小7口回老家,也是为了见老人最后一面。

早晨5:30的火车站,等待安检的队伍排到了站外。大多数人都戴了口罩。

小孩子总是充满好奇,喜欢到处摸碰。候车时,妻子全程攥着儿子的手,只要他碰了什么,就要用口手湿巾给他擦。湿巾还是婴儿专用的,不含酒精成分。

上车后,我收到公司HR的信息,要统计春节从武汉路过的职员名单。看着手机上不断弹出的疫情信息,我有些后悔。

或许,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。

车厢里几乎没人戴口罩,不时传来几声咳嗽。每听到一声,我和妻子的神经都会绷紧一下,把孩子抱得紧紧的,一路倍感煎熬。

下午3点多,我们终于抵达麻城火车站。这里距疫情最严重的武汉,也就两个多小时车程。

但小城里的多数人,还沉醉在过年的喜气氛围里。人们抱着大包小包涌出车站,目的地只有一个——家。

来接我们的伯伯并没有戴口罩,丝毫没有感觉到危险。

到家后不久,我的父母也开车抵达。岳父母直接回了距麻城40公里的木子店镇。

从这一刻开始,全家讨论的话题就是疫情。信息如潮水般涌来,或真或假,年轻人坐立不安,老人将信将疑。

第二天,我们开车到木子店的一个小村庄,与岳父母会合,看望妻子的爷爷。老人状态不太好,只能卧床。

在农村,几乎没人戴口罩,大家忙着备年货、打麻将、串门聊天。

为了戴不戴口罩、要不要提前回京的事情,妻子和岳父争吵了几次。岳父说:“哎呀,别大惊小怪,没事儿!”

1月23日上午,一个爆炸性的消息,惊醒了麻城的许多人——武汉,这个省会城市,关闭了离汉通道。

人们开始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,不敢随便出门。妻子一会儿觉得自己嗓子疼,一会儿觉得自己发烧了,一天给儿子测五六次体温。

当天,麻城发布通告,要求居民不要举行拜

年、集会等活动,妻子表弟的婚礼不得不取消了。

接下来怎么办,走还是留?无论是对我们,还是我们的父母,这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。

如果按原计划初四返回,一旦麻城也关闭离城通道,孩子怎么办?如果马上走,妻子的爷爷身体状况不好,也让我们很担心。

夜里,岳父的单位通知他早点返京。第二天,也就是大年三十的早晨,我们最终下定决心走。

为减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感染风险,我和妻子决定同老人一起自驾返京。

我父母的车刚上高速公路,轮胎就出了问题。考虑到小孙子,他们让我们换乘岳父母的车继续走,他们返回城里修车。

非常幸运,他们找到了一家修车铺。没想到,大年三十还开业。

换过新轮胎后,我妈看车空了,还跑回家装了一些土鸡蛋,要带回来给孙子吃。他们重返高速不到一小时,麻城也关闭了离城通道。

一路上,岳父极少摘下口罩。路上的车很少,没出湖北的时候,我们总担心,随时会被交警拦回去。

北上的路途让人揪心。我们尽量减少进服务区的次数,孩子尿尿就用矿泉水瓶接着。

后来,车开到豫冀交界时,高速封路了。交警把所有的车拦进服务区,看我们是北京牌照的,就放行了。

开了12个小时的车,我们终于到了北京,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。

晚上,坐在北京的家里,春晚刚开始不久,一家人饥肠辘辘。岳母在厨房忙碌着做点简单餐食。我们开始了居家隔离的日子。

每天早晨,我和妻子醒来的第一件事,是查看新冠肺炎感染人数,然后向社区和单位报告体温。

我们更加牵挂远在湖北的亲人。没想到,噩耗很快传来,妻子的爷爷大年初六去世了。

由于封路,岳父回不去。疫情笼罩下,没有葬礼,没有宾客。前几天岳父还说,晚上梦见了他父亲,哭湿了枕巾。

家人在哪儿,家就在哪里。比起一些人,我们这个家庭是幸运的。

从麻城归来后,我们只能暂时被迫宅在家里,而妻子的爷爷和那些逝去的人,却永远困在2020年这个冬天。(应受访者要求,汪诚为化名)

“家乡的地图被我染红了”

从武汉回老家过年的我,成了小县城的“一号病人”

口述:李叶子 | 33岁 | 保健老师 | 山西
整理:完颜文豪、薛园 | 本报记者
编辑:刘荒

活了30多年,从没想到我们一个家庭,竟然牵动了整个县城的神经。

我们这个山西南部的小县城,只有40多万人。这次疫情暴发以来,共发现3例确诊患者。这里面有两个都在我家,也就是我和我妈。

从武汉回老家过年的我,成了我们县里的“一号病人”。我们的病情,都快成了县里面最大的事,全县人民的心都跟着悬起来。

听说有一天,县委书记在例会上,说到疫情期间老百姓的配合与认可,动情得差点落了泪。

虽然我也是无辜的,听到这些总觉得挺歉疚的——毕竟是我先带回来了疫情,家乡的地图被我染红了。

好在,我们自己家的难关过去了。一周前,我和妈妈相继治愈出院了。为了慎重起见,县里还专门找个宾馆,让我家人去集中隔离一段时间。

此刻,我住在宾馆隔离。靠在窗边晒晒太阳吹吹风,心想“终于熬过去了,活着真好”!

妈妈住在另一个房间里,虽不能照面,但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她还像过去一样乐观,跟闺蜜们开着视频聊天,有说有笑的。

随着疫情下的紧张感慢慢消散,小县城渐渐恢复往日的平静。回过头想想这些天,简直就像做梦一般。

1月19日,我带孩子从武汉回山西老家,老公晚些时候才开车过来。

当时,武汉已经有了疫情苗头,说是不明原因肺炎。具体情况我不大了解,跟很多武汉人一样,也就没有太当回事儿。

到了老家,看到电视里采访钟南山院士,联想到以前的“非典”,我还发了一条朋友圈感慨——“要敬畏自然”。

万万没想到,此时我已把病毒带回老家来了。

家乡的小县城三面环山,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的人们,还开玩笑说:“易守难攻,病毒进不来。”

没过两天,我开始发低烧。因为我是保健老师,身体一直很好,就没往坏处想。服药后仍不见好转,就打算去社区卫生所,找医生打一针。

出门前,想起钟南山说“病毒存在人传人”,就特意戴上了口罩。现在想来,当时这一念之间,说不定减少了多少病毒传播的风险。

23日,一早醒来,武汉“封城”。我这才感觉事态严重,开始怀疑自己中招了,又害怕已传染给家人了。爸爸赶紧送我去县医院。我还幻想着拍个片子排除一下,图个安心。

我如实告诉医生,自己从武汉返乡。随后,进入发热门诊隔离,县医院拿不准病情,又联系省里专家远程诊断,当天诊断为疑似病例。

第二天,检测结果出来,我被告知确诊为新冠肺炎。不知道是地方太小,还是这件事情太大,我确诊不到2小时,就有人找我同学打听情况。

县里的疫情公告还没发,很多在北京、深圳,甚至国外的老乡们,都知道我的名字了。

一位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朋友对我说,内部早就传了话:一旦有确诊病例,就要提高防控措施,县城

所有公务员的年假,因此全都泡汤了。

小地方本来就啥事都瞒不住,发现首例确诊病例的消息,在全县大小微信群里迅速扩散。我和家人的姓名住址,几乎尽人皆知。

后来才知道,我去县里就诊前一天,还有一个武汉返乡女子,刚被医院解除隔离。之前,她发烧住院,县里紧急成立防治指挥部。后来,她退烧了,虚惊一场。

就在这时,令人猝不及防,我成了全县的“一号病人”。

24日,我被转到市定点医院。紧接着,我妈开始发烧,到县医院检测,从疑似变成确诊,转院后跟我住同一间病房。

爸爸的情况也不太好。因为送我就诊,他也被隔离在医院,又被查出胸片有问题。

那段时间,县防治指挥部“如临大敌”。因为我是武汉输入性病例,爸妈是密切接触者,要是有因他们而得病,就是第四级传染了。后面会发展成啥样,大家都不敢再去想象。

弟弟微信告诉我,跟我接触过的其他家人,都被通知限制出门,我们社区也被封闭了,严禁任何人出入。

连家门口的银行营业部,因为我妈去换过新钱,所有人员全部居家隔离。进出县城道路管制,发公告取消所有聚会,彻底摸排武汉返乡人员……小县城的“硬核”防控节奏,倒比很多省会城市都快不少。

我们这个小县城,平时在全市十多个县里,表现并不是最突出的,这次竟因我家,“拔得头筹”,被列为重点防控县,就连进入一级响应状态,都比市里早5天。

说起来,心里总有些忐忑不安——县里防控措施每次升级,感觉都与我家有关。我也从来没想到,自己会以这种方式,和一座